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丛书

Publication Series: MOE Supported Projects of Key Research Institute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Universities

语言文学类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20世纪中国语言学丛书 总主编 邢福义

20世纪 中国修辞学(下卷)

宗廷虎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
“21世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十大创新工程”重点扶持项目
《21世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十大创新工程》重点扶持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1世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 重点扶持项目

20世纪 中国修辞学(下卷)

李维周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丛书

Publication Series: MOE Supported Projects
of Key Research Institute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Universities

语言文学类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20世纪中国语言学丛书

总主编 邢福义

20世纪中国修辞学

下卷

宗廷虎 主编
高万云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中国修辞学 (上下卷) / 主编宗廷虎.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丛书/
20 世纪中国语言学丛书/总主编邢福义)
ISBN 978-7-300-08836-5

I. 2...

II. 宗...

III. 汉语—修辞学—20 世纪

IV. H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0058 号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丛书

Publication Series: MOE Supported Projects of Key Research Institute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Universities

语言文学类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20 世纪中国语言学丛书

总主编 邢福义

20 世纪中国修辞学 (上下卷)

宗廷虎 主编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70mm×228mm 16 开本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张 53 插页 4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860 000 定 价 98.00 元 (上下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高万云，1957年生，河北康保人，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等文论刊物，《修辞学习》、《汉语学习》等语言学刊物，《学术月刊》、《天津社会科学》等综合性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已出版专著三部：《文学语言的多维视野》、《中国修辞理论与批评》和《钱钟书修辞学思想演绎》。

策划编辑 李 颜
责任编辑 李咸菊 骆 骁
版式设计 赵星华
封面设计 杨立新

目 录

第五编 中国修辞学的全面繁荣 (1977—2000)

第一章 引论：20 世纪后 20 年中国修辞学的流变与走向	(435)
第一节 修辞学繁荣的社会动因	(437)
第二节 修辞学活动的有序组织	(440)
第三节 修辞学问题的有益争鸣	(443)
第四节 修辞学研究的突出成就	(460)
第五节 修辞学发展的潜在危机	(462)
第六节 修辞学成熟的必由之路	(466)
第二章 中国传统修辞理论研究	(471)
第一节 传统修辞理论的平稳发展	(471)
第二节 钱钟书的修辞学思想	(475)
第三节 李维琦的古汉语修辞研究	(505)
第三章 一般修辞理论的研究	(516)
第一节 修辞理论的全面建设	(516)
第二节 王希杰的修辞学理论研究	(523)
第四章 辞格研究的大突破	(537)
第一节 辞格研究的全面丰收	(537)
第二节 吴士文对辞格的全面研究	(544)
第三节 谭永祥对辞格建设的贡献	(552)

第五章 语言各层面的修辞研究	(562)
第一节 词、句、篇章修辞研究的并驾齐驱	(562)
第二节 郑文贞的篇章修辞研究	(568)
第三节 曹石珠的形貌修辞研究	(577)
第六章 修辞学跨学科研究	(586)
第一节 修辞学研究的多维视野	(586)
第二节 张炼强对修辞学的跨学科研究	(591)
第三节 郑颐寿的辞章修辞学研究	(600)
第四节 谭学纯的广义修辞学	(609)
第七章 修辞学史研究	(619)
第一节 修辞学史研究的历史性突破	(619)
第二节 宗廷虎的修辞学史研究	(630)
第八章 交际视野中的修辞学研究	(641)
第一节 形形色色的交际修辞研究	(641)
第二节 刘焕辉的言语交际修辞学	(651)
第九章 文学的修辞批评	(660)
第一节 文学修辞批评的蓬勃发展	(660)
第二节 倪宝元的改笔修辞研究	(668)
第十章 语体风格研究	(679)
第一节 语体风格研究的重要发展	(679)
第二节 黎运汉的汉语风格学研究	(685)
第三节 郑远汉的言语风格学研究	(691)
第十一章 文学语言研究	(699)
第一节 文学语言研究的空前盛况	(699)
第二节 骆小所的艺术语言学	(703)
第三节 冯广艺的文学语言研究	(708)

第十二章 相邻学科的修辞学研究	(718)
第一节 其他学科对修辞学的关注	(718)
第二节 汪曾祺的文学语言研究	(730)
第三节 王蒙对文学语言的立体研究	(737)
第四节 鲁枢元的文学言语学	(748)
第十三章 语言学家对修辞学的关注	(756)
第一节 多数语言学家都关注修辞学	(756)
第二节 吕叔湘的修辞学思想	(759)
第三节 胡裕树的修辞学研究	(765)
附录一 20 世纪前 50 年修辞学重要论文	(774)
附录二 20 世纪修辞学重要论著	(782)
附录三 20 世纪后 20 年相邻学科关涉修辞学的论著要目	(811)
附录四 修辞学译著要目	(822)
后 记	(825)

第五编 中国修辞学的全面繁荣 (1977—2000)

第一章 引论：20 世纪后 20 年中国 修辞学的流变与走向

科学发展，尤其是社会人文科学的发展始终受社会文化样态和发展程度的影响，修辞学作为人文科学的一支，自然也随着社会的演进而沉浮和涌动，前进或倒退。十年“文化大革命”，可说是中国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大倒退。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

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 1976 年 10 月“文化大革命”结束。

不过，在 1980 年以前这三年，犹如久处黑暗突遇强光，中国的科学文化需要一个调整和适应新的生存环境的过程。自然，修辞学也开始做转型和复兴的准备。由于破坏严重，所以修复工作非常艰苦，1976 年至 1978 年两年多的时间里，只有两三本由高校集体编写的修辞学著作问世，修辞学论文也是寥寥无几。1979 年虽出版了十多部修辞学论著，但只有三部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而这三部中还有两部既不是专门的修辞学著作，也不都是“文化大革命”后开始著述的。

第一部是郭绍虞的《汉语语法修辞新探》。该书始著于 1972 年，1979 年 7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在《前言》中第一句话就说：“这是一部有关语法研究理论的书”，而在《后记》中的第一句话则是：“我写这部书的主要意义，当然重在说明汉语语法必须结合修辞的论点。”这两句话其实并不矛盾，因为郭氏认为，汉语的特征就是语法必须结合修辞，甚至认为“汉语修辞所有包赅语法的作用，简直可说不仅是两结合而且成为混合体了”^[1]。郭氏的起点是“汉语语法的规律，本是经常和修辞结合在一起的”^[2]，他提出了汉语三大特点：简易性、灵活性和复杂性，并且以《词组篇》作为汉语语法简易性的代表，从汉语单位结构的一致性与“单音和孤立”等特点中，推出“词汇与语法互为因果”的结论，进而推出“必然会使修辞在中间发生一定的作用”^[3]。以《虚词篇》作为汉语语法灵活性的代表，认为“虚词的或用或不用，最足以说明汉语语法的灵活性，而它之所以能或用或不用的原因，也大都是取决于修辞问题的”^[4]。以《量词篇》作为汉语语法复杂性的代表，从量

词的常与变、虚与实、有与无等方面说明这都是“由修辞的需要而决定的”^[5]。可以说，这些认识有不少独到的地方，甚至某些方面确实深入到了汉语的本质，但由于过于强调二者的结合，以至于走向了极端，也由于表述重复啰嗦等原因，语法学界和修辞学界应者寥寥，在“语法修辞结合”的讨论中也多有批评之声。郑子瑜在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中国修辞学史稿》中说：“《汉语语法修辞新探》的出版，无疑地，汉语语法学与修辞学的研究，又到了又一个里程碑了。”^[6]而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修订版《中国修辞学史》中则删去了这一段。

第二部是钱钟书的《管锥编》。此书也始著于1972年，是作者从“干校”回到北京在造反派们的监管下带病且“偷空”完成的，中华书局1979年9月出版前四卷，1982年出版《〈管锥编〉增订》，1991年又出版《〈管锥编〉增订》（之二），全书计130多万字，征引古今中外4000多位作家学者包括7种语言的上万种著作，内容之博大精深，让人叹服。

《管锥编》是对中国古代十大典籍进行立体研究的札记，然而其中有许多篇幅论述修辞理论和修辞批评，不少方面直到今天仍然居于领先地位，如比喻理论、通感理论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蔡田明在《〈管锥编〉述说》中说“《管锥编》是一部重要的修辞学著作”^[7]，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把它纳入中国修辞学史。可以说，《管锥编》是1949年以来仅存的典型文言修辞学著作，它不仅引例全是古典文献，而且描写语言也是古典的文言文。可以说，此书既是中国文言修辞学的最高峰，也可能是中国文言修辞学的终结者。

第三部是郑远汉的《现代汉语修辞知识》。这部由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出版、仅有14万字的修辞学著作，以语言要素和逻辑要素的利用和语体风格为描写对象，发展完善了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的体系。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部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的修辞学专著。

然而，这些成就只能说是起步，严格地说，中国修辞学全面繁荣是从1980年开始的，20世纪的最后20年，才是中国修辞学作为一门科学走向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修辞学研究队伍之大，研究范围之广，研究成果之多，研究深度之深，前所未有，确实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不过，这一时期的修辞学发展也并不是全是坦途，其中也隐藏着潜在

的危机，当然也预示着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

第一节 修辞学繁荣的社会动因

易蒲、李金苓《汉语修辞学史纲》中指出：“社会大变革导致了修辞思想的变化”^[8]。这在 20 世纪末表现得很明显。“文化大革命”10 年如此，“文化大革命”后的 20 年也是如此。这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自由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

一个浅显的道理是：当人们需要说话且有说话的条件时才有讲究修辞技巧的可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政治文化环境相对宽松了许多，尤其是作为文化精英的知识分子，很大程度上有了说话的自由，有了为国分忧、为民请命的权力。而这需要有良好的表达策略和修辞方式，可以说，社会需要修辞，时代呼唤修辞学，于是修辞学有了再度繁荣的需要和可能。

二、科学教育的迫切需求

“文化大革命”后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发展教育，振兴科学。1977 年 8 月 13 日至 9 月 25 日，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决定改变“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革命化”招生方式，而采取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1978 年 3 月 18 日至 31 日，全国科学大会隆重开幕。1985 年 5 月 15 日至 20 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等等。所有这一切，使得中国的科学教育基本走上正轨。各级学校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各类教学用书越来越注重传递知识的方式，大学乃至中小学语文课本不但注重具有艺术性表述的作品，而且也注重表述的艺术性——增加了修辞学的内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各级各类组织机构相继成立，而这一切活动都直接以语言为载体，且都需要高效的语言表达，于是人们自觉地关注起修辞功能来了。

三、西方文化的强势涌入

文化的解禁使得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中国。越来越多的留学生互派，越来越多的国际交流，尤其是全国普及性的外语学习，使我们在大量地

接触西方文化的同时,也接触到了西方文化的传播方式,尤其是关于言语交际和修辞方面的理论和方法。首先是西方各种思潮与思想的引入,大大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和思路;其次是西方文学艺术的译介,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言说方式和参照系统;最后是西方各种语言学理论、符号学理论、修辞学理论、交际学理论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营养。如王德春、胡曙中、何自然、李幼蒸、常昌富、顾宝桐等的新知引入,大大丰富和深化了我们的修辞学理论。不仅如此,一些非语言学非修辞学领域如文学批评、美学乃至哲学界,也都频频发表有关修辞学的文章,甚至有人提出美学的修辞论转向。就连一些“很”不重视修辞学的高等学校也主动与修辞学结缘,如北京大学在 20 世纪 90 年代请来了加拿大的高辛勇演讲《修辞学与文学阅读》,请来了美国的浦安迪演讲作为修辞学的《中国叙事学》,还出版了美国布斯的《小说修辞学》等。

四、人际交往的强烈要求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在当今世界上,会说话不再是花言巧语、巧言令色的代名词,而成了人际交流、信息交换的先决条件;不会说话也不再是忠诚老实、忠厚实在的同义语,而成了反应迟钝、思维迟滞的外在表现。可以说,不会说话就是不会生存,不善于说话就是不善于生活。可以说,大到外交谈判、法庭论辩、大众演讲、政治宣言,小到商业营销、广告宣传、谈情说爱、说谎骂街,可说是导弹与唾沫齐飞,战火共文辞一色。于是,人们都希望自己能说会道,能言善辩;于是,各种教人说话、教人修辞的书也应需而生,从如何谈判、如何辩论、如何演讲,到如何问候、如何安慰、如何拒绝、如何请求、如何致辞、如何赌咒发誓写情书、如何搞恶作剧,林林总总,应有尽有。而所有这些,严格地说都属于修辞学分支学科,其中所谈大都是修辞策略和技巧。

随着改革开放速度的加快和程度的加深,以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交往的对象从南美热带雨林中的原始居民,到穿行在信息高速公路上的现代人群,无所不有。无论是吸取别种文化的精华,还是输出中华民族精神,跨文化交际都成了我们社会文化中一项十分重要的交际方式。所以,如何保持我们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如何实施汉语的言说策略,如何与异文化进行互动,越来越成为国人关注的问题。于是,跨文化交际的修辞问题也越来

越引起学者的注意。

五、大众媒介的迅猛发展

20 世纪 80 年代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文化的传播方式也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大大加强了对修辞的需求和对修辞学的研究。正如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所言：“我们的时代把研究对象最后转向语言，研讨语言媒介如何塑造日常生活。”^[9]“媒介作为我们感知的延伸，必然要形成新的比率。不但各种感知会形成新的比率，而且它们之间在相互作用时也要形成新的比率。电台改变了新闻报道的形式，正如它改变了有声电影的形象一样。电视造成电台节目编制中的急剧变化，其形式表现为编制最流行的节目或纪实小说。”^[10]这就是说，人类的文化遗产与负载它的媒介以及媒介的传递方式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如有声语言、文字语言、印刷品、无线电、计算机等，各有其自身的表现方式，要借助它们去传递信息，就必须懂得它们的功能及高效使用方式。可以说，20 世纪后 20 年是各种媒介交叠复现的时代，口语交际，手写体书信，印刷体大众传播，电话交流，广播电视的声像，互联网双向传递等，共同构成了人类的交际渠道。而各种媒介又有自己的区别性特征，所以对它们使用技巧的研究就成了这一时期修辞学的主要任务。比如互联网，因其具有快速、双向互动传输多种信息符号的功能，逐渐成了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尤其是国际性大众传播所选择的重要通道，它的时效性、互动性、高容性使它具有无穷的魅力。自然，它的“对面不相见，用字如用兵”的特殊方式吸引了不少修辞学家进行其规律探讨。再比如手机短信，这种借助电话的快速文字交流方式也有着自己的特点，对其修辞方式的探讨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口头言辩仍然是修辞学的永恒话题。这就使得修辞学更具实用性。

六、语文体式的多元存在

在本书的“纵论”中，我们提出了“修辞研究随文体的演进而演进”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的修辞论述是随着文体的演变而发展变化的”，并且认为这一论断适用于所有的修辞学史阶段。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中国很快摆脱了“文化大革命”时“口号论战体”的“一体化”表述格局，开始了众语喧哗、多体并存的新局面。从语体来看，口语中

的交谈体、演讲体和论辩体既进行了“消毒与去污”处理，也做了逻辑与艺术的改造。从文体来看，书面语中的各种下位体式都得到了健康发展，科技书籍的出版发展了科技体，社会生活事务的广泛改进了事务体，各种思想的正面接触完善了政论体，文学艺术的繁荣强化了艺术体。语言使用者的语体意识逐渐加强，相应地，修辞学研究者的语体学意识也随之提高。以文学创作为例，在诗坛上，80年代的“朦胧诗”和“后朦胧诗”，90年代的“知识分子写作”和“个人写作”，不仅做了汉语使用的大演练，而且做了汉语语境中诗歌创作的广泛论争，进而对诗歌创作的语言问题和修辞问题作了深层思考。在散文界，“老年体散文”、“女性散文”和“新生代散文”争相发展，“大众散文”、“文化散文”与“学者散文”并驾齐驱，“案头散文”、“广播散文”与“电视散文”同时生存，自然各种言说方式也就成了散文家绕不开的话题。在小说界，从“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寻根小说”等强调内容到“现代派小说”、“实验小说”和“新写实小说”等强调表现，作家们也逐渐重视语言技巧和修辞策略。尤其是“琼瑶热”、“金庸热”以及“王朔热”等“俗”小说，其修辞表现对国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戏剧界，无论是移植的话剧，还是国粹京剧，还是各种地方戏，尤其是电影、电视剧，以其特有的言说方式进入千家万户，影响甚至塑造着人们的说话方式。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吸引、呼唤修辞学家去探讨其修辞机制，于是，文学修辞的探讨就成了热门话题。不仅是修辞学界、语言学界，就连文学界和文学批评界，甚至还有美学界、哲学界，都有较为出色的文学修辞的论述，从而推动了中国修辞学的繁荣和发展。

第二节 修辞学活动的有序组织

时代产生了对修辞学的迫切需要，宽松的社会环境为修辞学的发展提供了极大可能，于是，中国修辞学的复兴事业在20世纪70年代末正式起步了，它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修辞学队伍的建设。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是学会的成立。继1980年11月21日成立中国语言学会之后，中国修辞学会是“文化大革命”后中国语言学界成立的第二个学术团体。1980年12月7日，中国修辞学会在武汉正式成立，从此，中国修辞学有了自己有组织的队伍，并且，这个队伍逐渐壮大，中国修辞学会